

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研究纲要*

裴长洪

内容提要: 在我国对外开放的长期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创立了“开放型经济”理论,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遗传了马克思主义优化培育的基因, 深深扎根于我国亿万人民的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 经过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辛勤浇灌, 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它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和国际分工理论, 创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 35 年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它的理论框架包括: 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作为纲要, 本文只是提出了理论的基本架构, 尚有大量内容需要研究和充实。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中, 我们能够从西方国际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借鉴的内容并不多, 可以直接为我所用的更少, 因此中国经济学者应当有这样的使命感和自信心, 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 创造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和理论范式。但是, 中国经济学研究在西方经济学学术体系的强烈影响之下, 要想走出一条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发展道路, 确实任重道远。

关键词: 中国特色 开放型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把对外经济关系列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文献可考。马克思在 1857 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有这样的分篇结构设计:“(4) 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 世界市场和危机。”^① 他还说“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 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② 因此, 改革开放前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教科书一般都有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内容。但是,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分析对外经济关系, 很长时期是个空白。进入 21 世纪后, 党中央抓了马工程建设, 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 我也曾参与文稿的修改。该书第四篇论述了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 应当说这是填补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对外经济关系分析方面的空白, 有很大贡献。但现在回头来看, 不仅认识落后于实践, 而且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要求也差距甚大。不仅内容显得单薄, 而且缺乏理论支撑, 基本上只是叙述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和我国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以及主要措施。

中国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 其成功业绩举世公认, 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则是发现和总结它的理论创新, 使之升华成为继续指导实践发展的成熟理论。2015 年 11 月 23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 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在这些成果中, 他提到了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可以肯定, 我国对外开放的长期实践中, 已经产生了重要的

*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邮政编码: 100836, 电子信箱: peichhcass739@163.com。

① 《导言(摘自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 1 版), 第 12 卷第 759 页。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 1 版), 第 13 卷第 7 页。

理论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应当有它的地位和内容。

我认为,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是我国对外开放长期实践的基本理论总结,在开放领域的各项理论创新成果中是概括性和纲领性的总名称,因此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对外开放领域中的主要内容和理论分析架构,需要理论工作者加以论证和阐发。

一、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

“开放型经济”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就提出要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之后他经常重申这些主张。到党的十二大召开时,他正式提出了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①之后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开放型经济”的提法,一直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才首次出现“开放型经济”这一新概念,全会提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发展开放型经济”。^②当时提出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区域上强调全方位开放,除了推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以外,还要着力推进沿边、沿江和内陆中心城市的开放;其次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加速转换各类企业的对外经营体制;再次是积极引进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所以在那时,这个概念是若干工作任务的集合体,并非就是理论,但是已经有了新理念的萌芽,它经历了内涵不断丰富完善、理性概括层次不断升高,最后成为理论创新的过程。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③对比过去,这里所说的“开放型经济”,增加了扩大服务贸易、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有步骤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等新内容。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指出我国应充分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机遇,并首次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④

党的十六大报告总结对外开放的成就时指出:“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商品和服务贸易、资本流动规模显著扩大,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并指出未来五年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⑤为了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的改革任务。^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任务是,要推进“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并首次提出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⑦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卷第3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③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④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000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⑤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⑥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⑦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5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党的十七大报告宣告,我国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未来的任务是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总的要求是,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里第一次提出了“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概念。^①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更加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并首次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与“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的主张。^②

党的十八大对开放型经济有了更完整的表述“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③对比十七大报告的表述,开放型经济体系的三个定语发生了调整和改变,“互利共赢”成为第一个定语,原来的“内外联动”改成了“多元平衡”,成为第二个定语。这种变化绝不可能是文字游戏,而是包含着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含义。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是在继续扩大服务业开放和外资准入以及推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举措、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背景下提出的任务。^④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也不断重申:“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⑤“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⑥并第一次提出了“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新理念。^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并提出“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⑧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出现“开放型经济”的提法之后20多年以来,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扩大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提法不仅被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以及领导人不断重复使用,而且其内容也不断丰富,包含了经济体系和体制、开放战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形成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合作新优势等重大理论命题,事实上它已经成为指导中国对外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作为一个成熟的理性思维,其基本要件是:总结了我国35年对外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我们党的价值观和追求目标;规划了未来的行动纲领。35年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实践是,不断改革不适应对外开放发展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努力扩大各种形式的对外经济贸易联系;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

^①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0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③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⑤ 习近平《在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二〇一三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3年4月8日),《人民日报》2013年4月9日。

^⑥ 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2013年10月7日),《人民日报》2013年10月8日。

^⑦ 习近平《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2013年9月5日),《人民日报》2013年9月6日。

^⑧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势,在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发展壮大自己,并接受、适应和引领国际经济规则。我们的基本经验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又要善于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在改革和开放的相互促进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实施开放战略的行动部署中坚持两种思维,既抓住和利用机遇,又有防范风险和安全意识。我们揭示的客观规律是: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并参与未来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构建,必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党的价值观和追求目标是: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平等公正、平衡和谐、合作共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我们未来的行动纲领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迈向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二、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基本品格:实践与创新

总结这个理论的形成过程,它的明显特征是:

(一) 政治决定、实践先行。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形成,离不开对外开放这个政治决定的大前提。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决定,这个政治决定来源于对世界大势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对世界大势有以下清醒认识,他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应当改变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随着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世界的主要矛盾,这是我们党可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国际环境。他还认为,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事情,也是发达国家的事情,世界市场如果只在发达国家兜圈子,那很有限度。这是中国可以实行对外开放的国际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世界经济和市场的情况下,封闭孤立地奋斗竞争不过他们,要靠开放政策打开出路。进入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经济和综合国力的较量日益成为各国竞争的主要方式。我党敏锐洞察这一世界大势的变化,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到了“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随后党的领导人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是世界经济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应当顺应潮流、趋利避害。^①这就为我国继续扩大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了新的认识依据。因此可以说,对外开放的政治决定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形成的政治基础和前提。

同时,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是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的,它要解决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因此它是一个动态发展、补充和完善的过程。这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以解释和验证过去发生的事情有很大不同。粗略划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开放型经济理论也经历了与时俱进的三个发展时期。20世纪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初步发展时期,也是开放型经济理念的开始酝酿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不断深化外贸、外汇体制改革,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货物出口贸易,争取更多外汇收入;吸引境外资金和技术,创办“三资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并进而完成从沿海开放城市到沿江、沿边的对外开放的空间布局。

1994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迈上了两千亿美元大关,更重要的是,通过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出口导向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成长,我国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已经形成,并能够连续创造贸易顺差。到1990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比重已达到80%,1995年,我国机电产品的出

^① 江泽民《在200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的讲话》(2000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11月16日)。

口比重上升到 29.5% ,开始大幅度超过纺织品和服装的比重 ,首次成为中国出口的第一大类商品;在 1990—1994 年间 ,外贸企业第二轮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已经完成 ,对外贸企业的财政补贴已基本取消 ,外贸企业已基本成为市场主体 ,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外汇调剂市场已演进为全国的银行间外汇市场 ,原先的双重汇率已变为单一汇率。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导向特征已基本形成。

表 1 1990—1994 年中国对外贸易(货物)情况

年份	出口	进口	差额	外资企业出口	比重(%)
1990	620.9	533.5	87.5	78.13	12.6
1991	719.1	637.9	81.2	120.47	16.77
1992	849.4	805.9	43.5	173.6	20.44
1993	917.4	1039.6	-122.2	252.4	27.5
1994	1210.1	1156.1	53.9	347.13	28.7

注:表中出口、进口、差额、外资企业出口的单位为亿美元。

资料来源 《海关统计》、《中国统计年鉴》各有关年份。

这个时期 ,适应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的要求 ,发展服务贸易以及要求在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方面有新的突破 ,从而把实施“走出去”战略等新的重大实践课题引入了开放型经济的理念之中。

这个时期 ,中国全面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 ,平均关税水平从 2001 年的 15.3% 降低至 2006 年的 9.9% ;取消了进口非关税壁垒 ,全面放开了对外贸易经营权。2004 年 4 月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明确将外贸经营权获得改为登记制 ,并删除了关于经营资格条件的要求。这个时期中国的外经贸法律法规与 WTO 基本规则接轨 ,为提高贸易政策的透明度 ,中国政府制定、修订、废止了近 3000 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陈德铭 2008)。在服务业开放中 ,中国承诺开放 100 个服务业领域 ,占 WTO 分类的服务部门的 62.5% ,已经全面履行承诺的有证券、建筑、旅游、教育、商业服务业等 12 个行业。同时 ,加大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可见这个时期“开放型经济”这一理念已经从刻画经济活动形式深入到刻画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制度、体制形式。

这个时期 ,开放型经济的硬实力迅速增强。1996 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 2900 亿美元 ,2001 年跃升为 5096 亿美元 ,2004 年攀上 1.15 万亿美元 ,2006 年达到 1.76 万亿美元 ,这十年间年年贸易顺差 ,2005 年贸易顺差超千亿美元 ,2006 年则达到 1775 亿美元。在吸收外商投资方面 ,1996 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到 548 亿美元 ,之后连年保持在 500 至 600 亿美元之间 ,2006 年达到 670 亿美元。随着服务业开放的扩大 ,服务贸易发展迅速 ,1996 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仅为 430 亿美元 ,2006 年增长到 1917 亿美元 ,其中进口额从 206 亿美元增长到 1003 亿美元。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 2003 年的 28.5 亿美元跃升为 2006 年的 211 亿美元。这个时期 ,硬实力和软实力都为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第三个时期是从 2007 年至今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标志着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基本形成。2008 年后发生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 ,世界经济进入衰退、恢复和调整时期 ,经济全球化面临新的形势 ,我国的开放型经济不仅面临要培育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新优势的挑战 ,同时又面临更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机遇 ,这就对开放型经济的内涵以及提法提出了修改、充实和完善的进一步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修改了开放型经济体系的三个定语的位置和提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完善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这些都是在新形势下对开放型经济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二)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时期。早在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就指出过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在我国对外开放实践中产生的开放型经济理论在哪些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创新发展呢?

第一个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创新。恩格斯认为,世界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①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这是马克思在未曾预料到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少数国家取得成功条件下的判断。列宁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指出这个统一的世界市场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预言了少数国家率先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②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斯大林认为这个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或两个对立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③我国的开放型经济理论,突破了斯大林两个平行和对立的世界市场的理论。我们说的两个市场,是指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主要是按照不同主权国家利益和经济制度划分的市场,而不是按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特征划分的市场;而且,这两个市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从而融合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我们需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

第二个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的创新。马克思认为,在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少数工业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形成对生产条件的垄断,扩大与落后国家的差距,将落后国家长期固定于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确实是国际分工体系的真实写照。二战以后,围绕这种分工格局,出现过“中心—外围”说、“比较优势陷阱”等理论,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类似“亚洲四小龙”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脱颖而出,原有的国际分工格局被打破,世界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国际分工理论滞后于实践的发展,暴露了局限性。中国的开放型经济理论顺应和总结了世界经济新的发展趋势,不仅提出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主张,而且提出了攀升全球价值链新台阶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培育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新优势”的新要求,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理论创造性运用的典范。

第三个理论创新是对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创新。20世纪70年代初期,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重大理论观点,而且搞了“一条线”的战略,既与日本、欧洲和美国结成统一战线以应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主要矛盾。^⑤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的外交斗争更加积极主动,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也有了恢复和发展,1975年在邓小平实行整顿工作的当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47.5亿美元,建国以来最高水平,而且1970年以来的5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6.3%。特别是,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日、中美建交,有效缓解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捍卫了中国领海、领土安全,并为1979

① 《共产主义原理》,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4卷第361—362页。

②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载《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22卷。

③ 斯大林,1951《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译本,1979),人民出版社,第23页。

④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发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4卷第444—459页。

⑤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6月4日),载《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卷第127页。

年我党工作重点转移以及与西方国家经贸关系的新突破都奠定了有力基础。可以说,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堪称当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杰作,尤其是在政治战略上划清了敌、我、友的界限,具有极强的动员力量和巨大杀伤力。进入新的时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如何在对外开放新形势下回答“谁是我们、谁是合作伙伴、谁是敌人”这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大问题,摆在了新一代领导人的面前。邓小平提出了对外开放是向西方发达国家、苏联东欧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全方位开放的主张;同时又一再重申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不变、坚持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的立场不变、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关系的立场不变、坚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立场不变。^① 邓小平的思想突破了传统战略思维,为新形势下我们反对什么找到了战略方向。1992年江泽民分析了世界多极化趋势,“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增强,地位上升,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轻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尽管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种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②这个分析指明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历史方位,以及中国与新兴力量的关系。胡锦涛指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必须建立和谐世界,致力于全球经济和谐发展,“各国应该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努力缓解发展不平衡问题”,“努力建立开放、公平、规范的多边贸易体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使所有国家都从中受益”。^③ 这个声明反映了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价值观和目标追求。习近平根据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我国开放型经济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理念,这既是我国扩大开放的行动纲领,又是扩大开放的理论指引,成为我党继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脉络的又一个新的理论创新成果。“一带一路”建设理念,继承了邓小平在对外开放形势下的战略新思维,从江泽民、胡锦涛的分析和声明中获取了更高层次的理性认识来源;既具有想像和憧憬,又具有行动感;既具备地缘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又具备具体的战略思维逻辑,回答了“谁是我们”(基于“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谁是伙伴”(不限于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体)、“谁是敌人”(霸权主义、发展不平衡、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以及一切威胁人类安全与和平发展的行为);从而也更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个理论观点的创新,使开放型经济理论更加丰满。

需要补充的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形成,离不开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参与和宣传。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广大理论工作者积极投入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发表了难以数计的理论文章和著作,如果以研究方向加以归类,这些研究成果有的是追踪国家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体制、政策与发展问题,如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研究、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研究、特区经济研究、加工贸易研究、利用外资研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研究、中国“复关”与“入世”研究、人民币汇率研究等;有的是追踪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研究,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建立和发展自由贸易区的研究;有的是追踪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研究;有的追踪中国与国际规则接轨问题的研究,如对多边贸易体制问题的研究,对知识产权、贸易救济、纠纷仲裁等问题的研究,包括对贸易新规则对我国影响的研究等;不少研究也致力于进行介绍和解释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国际经贸方面的理论;更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不少研究继续对马

^① 《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1984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1984年10月1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12月21日),载《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卷第98—99页、第3页、第70页、第281—283页。

^② 江泽民《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1992年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载江泽民2006《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

^③ 胡锦涛《促进中东和平 建设和谐世界——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协商会议的演讲》(2006年4月23日),《人民日报》2006年4月24日。

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回顾和新的解释(薛荣久,2008)。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对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添砖加瓦和添枝加叶的作用。

总而言之,我党创立的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之树遗传了马克思主义优化培育的基因,深深扎根于我国亿万人民的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经过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辛勤浇灌,日益枝繁叶茂,如今它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

三、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框架及主要研究内容

根据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精神,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框架可以简要概括为:

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

(一) 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既然是一个经济体系,它就应当具有立体形象,那么可以勾勒为下面的一个分析框架(裴长洪,2013)。

1. 开放活动的内容(即开放的部门和领域):(1)商品流动:物质的生产和贸易;(2)要素流动:资本和技术交易,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3)服务流动:服务和信息的可贸易性(服务贸易的四种形式)。

2. 开放活动的场所(即开放的空间布局):(1)沿海与开放城市(优惠政策的先期效应);(2)内陆与沿江城市(市场准入的差别);(3)边境地区(市场准入的差别)。

3. 开放活动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1)双边经贸关系;(2)多边经贸关系;(3)区域合作关系(上海合作组织、APEC等);(4)区域经济一体化(自由贸易区)。

互利共赢,是这个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第一个属性。西方发达国家可以说都是开放型经济体系,而且就目前的开放水平看也都比我国更开放。如果我们只是朝着继续扩大开放方向与它们看齐,那我们与它们就没有区别,充其量不过是后来追上来的一个发达国家,富国俱乐部增加一个成员而已,那我们说的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特点,在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中就缺乏亲和力,所以我们强调互利共赢。怎么能实现互利共赢呢?首先当然要研究的是中国自己市场的开放。货物与服务市场的开放都是贸易伙伴关切的问题,除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要研究市场的公平竞争,哪些因素妨碍了公平竞争,实现哪些改革才能真正做到让我们的贸易伙伴公平分享中国巨大市场的利益。其次要研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的福利效应。对东道国的就业、贸易创造以及税收产生了什么结果。如果只对自己有利,而对东道国贡献甚少,那就可能产生“新殖民主义”的曲解。再次要研究贸易的国际规则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国际规则制定有哪些要求。最早西方发达国家鼓吹贸易投资自由化,说自由贸易的中性规则(或竞争中立)可以使交易双方都有利。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党和国家审时度势、勇对挑战、有保留地接受了这个说法和人家制定的商业规则,并努力使自己适应和运用规则,创造条件使自己在交易中获取相应利益,但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也不是每个发展中经济体都能够象我们这样做到的。因此所谓的“中性规则”其实并非完全公平合理。现在我们已经成长为贸易投资大国,而且有条件接过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旗号去与西方发达国家交涉自己应得的利益,对发达国家而言,贸易投资自由化也好,中性规则也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的武器。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拿着这些说辞去对第三世界的穷国说,就有英雄欺人的嫌疑了。在发达国家面前,我们需要研究如何加强在规则制定中的能

力,同时研究如何让这些规则照顾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在发展中国家面前,我们需要研究“南南合作”中对双方都有真实利益的商业规则。

多元平衡,是这个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第二个属性。我理解的多元平衡,主要是三方面的平衡。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内在性与外部条件的平衡,集中表现为内外需的平衡。这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中国作为大国,发展经济只能以内需为主,根据过去我主持的商务部委托的课题“中国内外需协调发展研究”的计算,即便在1978—2008年这30年间,外需在中国经济总需求中的比重不超过15%,所谓中国经济依靠外需增长的说法并无研究依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个比重大幅度下降。那么讲平衡究竟又如何量化?通常外需指的是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由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反映。但是随着我国金融开放和人民币跨境交易结算的发展,境内外资金流动比过去自由和频繁,外汇进出和收支经常是由于境内外人民币汇差和利差所导致,并非真实贸易投资活动的记录。这就给我们依据国际收支来计算外需的数量带来了困难和误差。如何克服这个技术困难并给出内外需求平衡的量化概念,是研究要克服的难点。其次是与贸易伙伴利益关系的平衡,集中体现为进出口贸易平衡以及资本进出流动的平衡。其衡量标准不仅要看国际收支,还要看贸易投资活动的互补性以及双方社会福祉的增进。再次是国内深化改革与营商活动规则日益国际化之间的平衡。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完善中,仍然存在着不少不适应国际化发展趋势的体制性矛盾,无疑需要改革,但这些改革内容都具有复杂性和牵连广的特点,而不少国际规则和国际合作范式也处在或即将变革之中,因此要讲求两者之间的平衡,讲究顶层设计和试验先行,否则将导致进退失据、宽严皆失。所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也包含这方面的内容。

安全高效,是这个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第三个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金融危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大胆开放,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另一方面要防范危机对我们的冲击。防范经济金融风险是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必须具备的安全阀。因此要研究这个安全阀的设计、制造、安装、监测以及运行管理。所谓高效,是要求这个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最低化、效率最大化。因此要研究是什么因素导致成本高、效率低。一般而言,体制障碍导致制度的交易成本高、效率低;机制障碍导致管理成本高、效率低;技术障碍导致操作成本高、效率低。例如,推进贸易便利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是主要的体制障碍,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改革空间主要在这里;海关和口岸管理的各个部门,政出多门和不协调是主要的工作机制障碍,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空间主要是整合这些管理规则和管理工作,实行“单一窗口”的改革试验;港口和码头作业的设施、技术落后会形成贸易便利化的技术障碍,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空间就是实现港口和码头建设的信息化、现代化。

(二)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个新体制主要包括六方面特征:

第一是建立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相适应的新体制和新机制

由于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还不够,因此要促进服务业开放潜力的释放。关于我国产业开放度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文献,但是承诺开放与实际开放的差别需要在研究加以区别。承诺开放可以从中国在多边贸易体系或各种区域合作的议定书和协议中找到,但这不等于实际开放,还需要从服务业吸收外资的数量和结构中,服务贸易发展的数量和结构中,以及在国际比较中发现需要改进的空间。

第二是建立适应多种形式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新体制和机制

这包括: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增强投资主体权利;因此,要研究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1)扩大备案制的适用范围。(2)建立核准制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步向审批事项的“负

面清单”管理迈进,做到审批清单之外的事项,均由社会主体依法自主决定。

以多边贸易体制为出发点,以区域自贸区建设为重点突破。因此要研究加速区域自贸区谈判,升级现有区域自贸区;要研究可能增加哪些国际贸易新规则、新议题的谈判,如何建设面向未来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以应对美国 TPP 酝酿的国际贸易新规则。要追踪研究上海、天津、广东、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进展并总结其成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其他条件具备的地方大力复制和建设类似的自由贸易园(港)区。要研究中美、中欧投资协定、美国 TPP 谈判内容及其协定文本,既为参与国际新规则制订提供借鉴,也为我国自贸区升级版建设提供参考。同时,要研究美国 TPP 谈判内容及其协定文本对我国的实际影响,以及我国如何应对。

第三是建立具有战略纵深和双边、区域合作广泛利益共同体支撑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开放程度的不协调,更多体现为内陆沿边和沿海开放的不协调。内陆沿边开放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主要潜力所在,是拓展开放型经济广度和深度的关键所在。因此要研究内陆与沿边扩大开放的体制机制建设。

要研究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在拓展经济发展战略空间的同时,因地制宜、因国施策,发展双边、诸边、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增强我国开放体制的国际支撑力。

第四是逐步培育具有与海洋强国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

我国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离不开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经济合作,我国开发海洋资源和发展海洋经济刚刚起步,未来潜力很大。新的体制机制建设应当有超前意识,要研究如何建立有利于提高我国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同时又能够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体制机制;如何发展海洋装备制造产业和海洋工程设施产业,使我国海洋工业从只会造船迈上更高的台阶;海洋的服务产业从在岸贸易和运输向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基地,向海洋科研教学、科研实习基地,以及向海洋勘探、检测的服务基地方向提升转变。要研究什么是“海洋强国”,发展海洋经济与发展海洋强国的关系,我国成为“海洋强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第五是具有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重点是研究如何进行法律、法规的修订和重建。要研究“国际化”的坐标是什么,它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过程,我们的建章立规工程如何适应动态化的国际规则。要研究塑造新的营商环境的主要内容,在不依靠优惠政策体现的条件下,优良的营商环境需要哪些条件和努力,建设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主要措施。

第六是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

要研究贸易便利化改革涉及的有关问题,如海关等各监管部门的协调,以及如何简化程序提高效率;要研究投融资改革,如何适应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从重事前审批转为重事中事后监管;要研究服务产品市场化所涉及的问题,如市场构建、价格改革以及市场监督管理等问题;要研究人员流动以及劳动力市场管理改革、境外人员居留等一系列管理改革;要研究信息沟通所涉及的网络、移动互联等领域扩大开放后所面临的管理工作的转变和完善。

(三) 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主要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供给的要素禀赋优势,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主要以价格低廉取胜,这使我国许多中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中赢得较高的份额。随着我国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形势的变化,原来廉价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已经并继续弱化,未来在向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中,应当培育哪些新的潜在的优势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新的比较优势。随着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资本要素价格均等化趋势的作用,我国部分产业中资本和技术密集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如高铁设备和一些基础

设施装备,这些产品将成为我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随着我国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新一代劳动者的文化教育水平已经明显提高,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本将成为我国新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进而成为一些新产业和新产品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产品。

第二是“走出去”形成的价值链、供应链优势。随着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不仅布局国际生产,而且形成国际营销网络,形成由我国企业自主的价值链和供应链网络,这将使我国经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

第三是国内市场优势。2014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口额达到1.96万亿美元,向全世界提供了1/10以上的货物市场份额,服务进口达到3835亿美元,提供了7.9%的世界市场份额。这样庞大的贸易规模必然吸引全世界投资者的关注和青睐,必然对我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主动作为提供有利因素和必要条件。

第四是体制优势。如何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优势要素,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尽管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但它继续完善和与时俱进的更新动力很强,自我发展能力也很强;而国际经济领域中的规则和制度规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除个别超级大国,相当多发达国家一旦适应原来的国际规则,它要比发展中国家更不适应需要不断变化的国际规则,特别是不适应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影响下的国际规则变化。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更新和发展能力恰恰具备这种适应国际经贸环境变化的优势。而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强调“有效的市场”,而且也强调“有为的政府”,从而使我国经济体制的竞争力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第五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能力的优势。我国正在培育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并已经在国际经济领域开始发起新倡议、新议题和新行动。这标志着我国开始培育自己生产和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能力。随着我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增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能力必然逐步增强,这种优势也必然不断发展。

(四) 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

第一是完善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要研究什么是“各有侧重的对外开放基地”,我国各个区域对外开放的起点不同,时间也有早晚,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对开放型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因此不同区域的外向型产业集群建设也必然有其各自的特点,应当总结不同类型的发展路径。在沿海发达地区,应当研究如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这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原有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同时要研究在产业转移中形成沿海与内地互连互补的专业分工关系,以空间延续廉价劳动要素的优势。中西部地区将会更多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不应该重复沿海地区早期工业化的模式。应当在沿海向内地的产业转移中,保持沿海与内地的专业分工联系,建立互补的产业体系,形成沿海与内地优势互补,沿海与内地紧密结合的供应链体系,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发挥中国大国的综合竞争优势。

第二是完善对外贸易布局。核心是要研究如何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贸易强国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不同时代它都有特定的时代内涵,体现这些内涵的国家也不同,既没有“日不落帝国”,也没有在所有商品和服务领域的“全能冠军”。一般来讲,资源和要素禀赋、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贸易的支持条件(如运输、国内产业与贸易政策)是一国或经济体经贸发展强弱水平的三个最重要因素。根据当代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谓贸易强国的主要标准是:在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中利用已有比较优势和培育新优势的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一国境内的生产能力不等于国际的交换能力,国际的交换能力往往还取决于跨国生产能力、国际运输能力、国际营销能力等等;本国货币在世界的流通能力,国际交换中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权不仅来自一国商品和服务的贸易量,而且还来自该国货币在世界的流通能力;国际交换中的商品与服务的技术标准制订能力;全球或国际

交易规则的制订能力,技术标准和国际交易规则,都是一种公共品。能够生产和提供这类公共品的国家,一般都是贸易强国。

第三是完善投资布局。要研究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更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未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导向是什么。“三个有利于”是未来完善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基本导向,即有利于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有利于培育我国经济新的国际竞争力。其政策取向是:继续扩大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逐步开放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文化、各类中介服务等领域的外商投资;着力吸引具有先进制造业技术、工艺、管理优势的外商投资。

同时还要研究如何提高企业“走出去”的水平。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的要求,未来如何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培育一批跨国企业。如何积极搭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金融服务平台,形成中国企业自主的跨国生产经营网络。要进一步研究如何确立互利共赢和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立足点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指导方针,以建设自主国际化生产经营网络作为战略目标,来规划企业海外投资并建立与此相关的服务促进体系的思路,并使之落到实处。政策研究的课题是,如何鼓励制造业领域的投资,鼓励多采取绿地投资方式,在服务体系建设中,要研究针对民营企业的弱点和不足,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有效率的服务。同时要研究如何改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经营的统计、税收以及绩效考核等方面的管理。

(五)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

全球经济治理就是生产和提供一种全球公共品。国际公共产品,第一类是各种技术标准和国际商业规则,包括多边的国际规则和区域的国际规则。第二类是主权经济体为国际规则提供运行载体和平台所提供的成本,还包括为特殊国际经济问题提供的援助,这些都属于全球或国际性的公共品。这种公共品的供给与供给能力有关,供给能力取决于经济硬实力,也取决于文化软实力。硬实力以经济、金融、科技和重要资源为后盾,软实力则需要话语权以及自身的体制、机制的优势(裴长洪,2014)。为此要研究我国如何增强国际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特别是要研究如何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一方面如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具备与国际商业规则接轨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如何使我们在国际交易中的话语体系更具有影响力,即能够把我们的故事讲得更动听,更有亲和力。

还要研究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策略。2015年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已经出笼,尽管这个协定的生效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但它试图重新书写未来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基本框架已经成型面世,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对待。可以预料在一个时期内,美国试图把中国排除在外,我们的应对策略就是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和面向全球的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以更加积极主动融入世界经济的实际行动来打破孤立我国的企图。这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策略的新运用和新实践。

四、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借鉴和扬弃

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的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在于立场和认识论的分歧。前者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制度,其认识论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其必然灭亡,必然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的发展规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其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当然,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的几百年间,也提出了不少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以及经济发展规律的观点和认识,采用了包括统计学、高等数学以及数学模型等现代方法来描述经济活动,建立了适应这种“精确化”研究的分析

框架和研究范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话语体系,加上西方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特别是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使这一套经济学学术体系风靡全球。中国经济学研究在西方经济学学术体系的强烈影响之下,要想走出一条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发展道路,确实任重道远。

在对外经济关系领域,西方学者把各种经济学流派中有关对外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分析和理论拼凑为“国际经济学”,并作为大学教科书和知识体系广为传播,目前我国高校中广泛使用的《国际经济学》教材基本上是这种知识体系的介绍和解读。其中,有反映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以及该流派的后来继承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和不安全竞争理论,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等;有反映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市场均衡理论、汇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等;有反映把各种经济学流派(包括凯恩斯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加以综合的理论内容,如贸易政策、关税同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这个体系中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的内容不少,而且有些概念也为我们所借鉴和吸收,如“比较优势”和“经济全球化”等,但总体来看,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的理论则很有限,可以把它作为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则几乎没有。在我们的政策语言中,与这个知识体系有关且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比较优势”,但我们政策语言中的“比较优势”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也是不同的,后者说的是两个国家、在两种相同产品的生产中,都不具备生产率优势的一国可以选择劣势较少的某一产品来开展国际贸易,赢得专业分工的利益。而我们讲“比较优势”,首先是一种工作状态和动员,也包括发现“绝对优势”(你无我有),要素禀赋优势(你少我多),还包括创造竞争优势(你有我优、我廉)。所以,我们讲“比较优势”,已经是一种演绎和发挥。再如,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全球化这些理论概念,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虽然有解释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一面,但它是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它只讲让渡国家主权;它也只讲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福利的增进,不讲经济金融风险,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欺骗性。一旦发现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也可以得到好处,原来拼命鼓吹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人就会马上提出“去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再平衡”理论,完全暴露了鼓吹这些理论的人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立场。

在其他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理论中,绝大多数是以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实践为依据的,例如相互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理论、企业优势、内部化和交易成本理论等等,都只能解释发达国家贸易和相互投资的发展,而不解释(也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投资的经验。涉及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问题的成熟理论很少,而且也很陈旧,例如“中心—外围”理论,资金外汇两缺口理论等等。

西方国际经济学把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扩展到世界经济领域,形成的所谓世界市场均衡理论是最缺乏科学性的。它宣扬资本主义经济通过自由市场可以达到均衡,在国内市场上靠价格来调节,在世界市场上靠汇率来调节。因此汇率理论和国际收支理论是西方国际经济学宏观理论的核心。随着西方国家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破产,世界市场均衡理论遭到无情讽刺;随后浮动汇率理论登场来修补均衡理论。20世纪80年代美国依据这个理论来压迫日元、西德马克升值;21世纪初又压迫人民币升值,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世界经济平衡。但事实上却与美国的愿望完全相反,日元和马克升值并没有导致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减少,人民币升值也没有使美国贸易逆差下降,这种浮动汇率理论实际上已经破产(见表2与表3)。

上述说明,在建设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中,从西方国际经济学知识体系中能够借鉴的内容并不多,可以直接为我所用的更少,因此中国经济学者应当有这样的使命感和自信心,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创造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和理论范式,为此,要解决以下一些认识问题:

表 2 美元对西德马克和日元的汇率以及货物贸易差额

年份	西德马克兑美元汇率 (马克/美元)	日元兑美元汇率 (日元/美元)	美国对西德贸易差额 (亿美元)	美国对日本贸易差额 (亿美元)
1975	2.460	296.79	4.50	3.715
1976	2.518	296.55	12.60	-40.594
1977	2.322	268.51	-4.266	-76.052
1978	2.009	210.44	-13.612	-104.328
1979	1.833	219.14	-2.513	-61.386
1980	1.818	226.74	23.411	-73.428
1981	2.260	220.54	11.088	-136.082
1982	2.427	249.08	0.381	-123.612
1983	2.553	237.51	-19.259	-185.442
1984	2.846	237.52	-54.622	-335.425
1985	2.944	238.54	-80.655	-405.846
1986	2.171	168.52	-131.681	-525.164
1987	1.797	144.64	-135.950	-530.607
1988	1.756	128.15	-94.377	-479.778
1989	1.880	137.96	-44.732	-457.010
1990	0.826	144.79	-61.038	-382.796

注: 汇率数据来自于 UNCTAD 数据库。西德和东德在 1990 年统一, 该年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比较大。贸易差额由美国对西德或者日本的货物(merchandise trade)出口减去进口得到, 负值表示美国的贸易逆差。进出口原始数据来自于 IMF 的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DOTS)数据库。

表 3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元人民币/美元)和中美货物贸易差额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汇率	827.70	827.68	819.17	797.18	760.40	694.51	683.10	676.95	645.88	631.25	619.32	614.28
顺差	586.13	802.7	1141.7	1442.6	1632.2	1708.6	1433.6	1813.0	2023.4	2189.1	2158.5	2370.4

资料来源《2015 中国统计年鉴》第 637 页,《海关统计》各年。人民币汇率为年平均价。

首先是要解决立场问题。要建设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热爱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衷心拥护领导这个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投身于研究如何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研究工作中,而不是把中国的事情看做是与自己不相干的事,置身事外,或者只是从事专门挑毛病的研究(一些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情的),那是必定难以承担我们的历史使命的。在一次会议上,有个境外媒体朋友问,为什么中国大陆没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我回答,我不知道你说的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标准是什么,但我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我还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研究者与这个伟大的成就多多少少有些联系,而境外所谓的真正的经济学家却与此无关,那么这种真正的经济学家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的回答赢得全场掌声。我们不能指望依靠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家来解释和回答中国的问题,这是中国学者自己的事情。要有为国家做事、为人民做事的情怀,才能有所作为。即便是资产阶级的学者要有所建树,也需要有“忧国”情怀。有人把是否有诺贝尔奖看做是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被承认的唯一标准,这是片面的。且不说这种评奖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实际上还有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背后支撑。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也是被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所垄断,美国的崛起使诺奖得主转移到美国,试看未来诺奖花落谁家,可以预言,随着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上

升,中国学者被国际学术社会承认是必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国际学术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必然的。

其次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论文是以“精确化”研究为导向,以数量模型为主要分析工具,因此它需要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它既具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被滥用的另一面。不仅实证研究采用模型分析方法,连理论表达也常常用模型来演绎和论证。这种研究范式,既产生了不少具有数量化支撑的有学术价值的作品,也制造了大量庸俗和垃圾。我们对此需要区别对待,不可盲目崇拜。许多学术论文并没有什么研究发现,却用了最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分析论证最简单并早已为人所知的事实,这种为使用模型而做文章的倾向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洋八股”,我们应当坚决反对,并防止谬种流传。我们的研究范式,应当强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为导向,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为目的,因此要有必要的政策思路的涵义,当然也需要对一些专门性的问题作出判断或加强某个判断。一般来讲,重大的理论问题是难以用数学模型来论证和表达的,而应当学习《资本论》、《帝国主义论》等经典著作的研究方法,用历史与辩证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用可靠的统计数据来支撑和证明。一些专业性特征十分明显的经济问题,涉及经济社会各领域交叉性较少,即解释变量因素不复杂的问题,在数据可获得的情况下,采用数学模型方法才具有“精确性”研究的前提和条件。所以应当实事求是,因文制宜,既反对无模型不成文的倾向,也反对拒绝使用数学模型的片面性。还需要强调,采用数学模型作为主要分析工具,是以科学的“假设”为前提的,数学模型是用来论证和加强“假设”提出的判断,但是如果大量的调查研究和一定数量的统计数据做支撑,怎么能产生科学的“假设”呢?所以,下功夫做调查研究,下功夫收集数据和文献资料,是任何研究方法都无法离开的不二法门。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往往不愿意做这种耗时耗力的基础工作,只是从西方文献中找出现成的结论作为自己的“假设”,然后借鉴或抄袭一个数学模型,采集一些面板数据,拼凑成一篇论文。作为学习阶段,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这不是真正的研究,应当从这个幼稚的阶段逐步走向成熟。

再次是如何建立中国学术论文的话语体系。“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坛摆脱了以文言文为主导的传统话语体系,产生了现代中国语言的话语体系,它的进步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更贴近大众生活,二是更有利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但要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解放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洋教条和食洋不化的文化现象是旧中国殖民地文化的病症,反映到党内,有“党八股”现象的出现,毛泽东同志写的《反对党八股》和《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系统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以及它所表现的话语形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习市场经济,引进和使用了许多与市场经济相关的专门词汇、概念和理论。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理论、包括国家经济政策的话语表达形式。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中国的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不仅熟悉了这些新的话语表达形式,有的还向其注入了中国元素,赋予其新的含义,形成外来文化被融合同化的现象,从而形成了中国式的话语体系,使“English”变成了“Chinglish”,经济学研究及其学术论文当然是走在这个学习过程的最前沿。站在最前沿容易产生两种可能性,一是落后于大潮流和人民群众;二是孤立冒进并脱离人民群众。在留学海外热潮逾三十年经久不衰以及国家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环境下,第一种可能性不容易产生;而第二种危险却较为容易产生。一些人把生硬翻译过来的西方经济学论文的表达方式看作是经济学规范的话语体系,把被多数人读不懂的话看做是“学术”,认为“学术”只需要少数人看懂和欣赏,多数人看得懂,就不是“学术”了,至少也属于“学术水平不高”。怎样处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关系,是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他说文艺作品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所谓源于生活就是不能脱离生活,不能不接地气。中国经济学的话

语体系,也不能脱离多数(这个多数已经有职业范围的限定),如果我们的经济学论文只有极少数人看得懂,连多数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多数政府经济工作官员(基本是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多数有文化的企业家和其他知识界人士都看不懂,那还叫“为人民服务”吗?真理是朴素的,往往不需要深奥的语言,而庸俗却需要故弄玄虚来掩饰浅薄。当然,经济学研究又要高于普通的时事新闻,不仅要适当介绍和引进新词汇、新概念和新思想,还要有学养基础和学理逻辑。因此要在多数人读懂基础上提高和不断提高,我们的话语体系应当朝这方面努力。这样说有些人会很不以为然,有人会问,经济学诺奖著作多数人看不懂,难道不是学术吗?是学术不假,但这里不仅有意识形态倾向要考察,也有一个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要审视。拿艺术作品来比喻,《天鹅湖》无疑属于世界文艺精品,但在解放战争期间,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是靠看《白毛女》来激发阶级仇恨和奋勇杀敌的,看《天鹅湖》不仅不适宜,而且当时也不具备多数人欣赏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从感染人、激发人的情感的艺术标准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标准来看,《白毛女》无疑达到了艺术标准和政治标准的统一,是当时我国的艺术精品。同理,今天我们的话语体系,更多地是需要多数人读懂基础上的提高和再提高,这是我们应当提倡和努力的主要方向,当然有少量只有少数人才能读得懂的学术文章和著作,也应当允许存在并参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但主次不能颠倒。

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除了要坚持多数人读懂基础上的提高和再提高,还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我一直以为,中文与英文之间的翻译,有时候是很难表达原意的。例如,物流一词的英文是“logistics”,原意是军队的后勤保障,翻译成“物流”,就容易望文生义,把这个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平大大埋没了,以至于在实践中走了样。反过来,中文要翻译成英文,有时候也很难,例如“三个代表”怎么翻译?“开放型经济”要是翻译成“openness economy”,还是我们要表达的意思吗?所以,龙就是“long”,翻译成“dragon”,就成了“凶暴怪兽”了。

参考文献

- 编写组 201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
 陈德铭 2008《中国特色商务发展道路——对外开放30年探索》,中国商务出版社。
 裴长洪 2013《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理论探讨》,《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
 裴长洪 2014《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与中国扩大开放》,《经济研究》第4期。
 薛荣久 2008《国际经贸理论通鉴》(下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The Outlin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Kaifangxing*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i Changho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innovated the theory of *kaifangxing* economy during the long period of China's opening-up, which has been one important content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 theory came from the heredity of Marxist optimal gene,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Chinese people, and has become a big theoretical tree owing to the hard work of the masses of Chinese researchers. The theory innovated Marxist theories of world market and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novated Mao Zedong's three worlds theory, and appeared as a theoretical summary of basic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during 35 years of China's opening up. Its convention includes: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下转第46页)

Macro-policy Transformation ,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Adjustment and Inflation Expectation Management

Ma Wentao^a , Feng Genfu^a , Li Cheng^a and Wei Fucheng^b

(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b: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This thesis mad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ed mechanism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cro-policy and management of inflation expectation by the construction of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ina. The results show , the macro-policy of China shifted from the administrative-intervention-oriented regime to the market-oriented regime in 1998 , which results in expectation trap before 1998 and the curb of inflation expectation in the short run after 1998 ,but because of the trade-off between anti-inflation and the stabiliz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hift of main influencing channel of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on economy which shift from the spillover effect on market-oriented tools to adverse selection effect on the basis of micro level of soft budget constraint ,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cro-policy results in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stance of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state of credit supply which challenges the management of inflation expect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inflation expectation a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 further clarify the boundary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and gradually get rid of highly dependence on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in macro-policy.

Key Words: Policy Transformation; Inflation Expectation;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JEL Classification: E19 , E32 , E37

(责任编辑: 陈小亮) (校对: 梅 子)

(上接第 29 页)

kaifangxing economy with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 multi-balance , safety and high efficiency; building a newer system of *kaifangxing* economy; cultivating new advantage of participating in and lead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perfecting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opening-up; involving actively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As an outline , this paper only raises a basic analytic framework , while a large number of issues require research and enrichment. While building and developing the theory of *kaifangxing*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few lessons could be drawn from the western knowledg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of which even fewer could be applied to China immediately. Therefore , Chinese economic scholars must have such a sense of mission and confidence that we should go our own way of building China's distinctive academic system and theoretical paradigm. However , it is indeed a long and arduous task to blaze a new way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 which reflects development rules of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and typifies China's manners and spirits , under the western economic academic system's strong impacts on China's economic research.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ory of *Kaifangxing* Economy;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JEL Classification: F41 , F59 , B24

(责任编辑: 荆 岩) (校对: 张 涵)